

沈从文的 生命诗学

吴投文 著

东方出版社



I207.22/209

2007

沈从文的 生命诗学

吴投文 著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何 奎

封面设计:肖 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从文的生命诗学/吴投文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12

ISBN 978-7-5060-3018-2

I. 沈… II. 吴… III. 沈从文(1902~1988)—诗歌—
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0209 号

沈从文的生命诗学

SHENCONGWEN DE SHENGMING SHIXUE

吴投文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1.125

字数:29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5060-3018-2 定价:2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前言

沈从文创作与思想的独特性一直是研究界探讨的焦点所在。本书在借鉴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揭示沈从文创作与思想的独特性的突破口是沈从文对生命的独特观照及由此形成的生命诗学。本书试图综合运用生命哲学、心理美学、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系统地梳理沈从文的创作与思想，从中归纳出沈从文的生命诗学构架，试图由此揭示出沈从文创作的特性与丰富性。

本书导论部分指出，沈从文对生命的探究与信仰及其传达出其审美理想的独特性，蕴涵着他对人生内容与生命形式的独特思考，这构成其全部创作的基本取向。生命信仰在沈从文的全部创作中具有统摄性意义。在他关注的所有问题中，生命问题是最为核心的问题，他所谈及的问题往往最终总要归结到生命问题上来，而在他直接谈到生命问题时，则又联结着与生命相关的种种问题，沈从文的创作始终与他对生命的独特思考相关联。在他的全部创作中，呈现出一个生命诗学的构架，这是其创作最为明显的标志，也是其创作独特性的根源所在。本书提出沈从文生命诗学的构想，意在为揭示沈从文的创作独特性探索一条新途径，深入探讨沈从文创作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就此而言，沈从文生命诗学的提出，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方法论

和研究领域扩大的问题，而是一个能够切入沈从文创作独特性的根本性问题。沈从文的创作显示出卓异的品格与美学追求，就其创作的全部独特性而言，称之为“沈从文范式”并不为过，这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章考察了沈从文生命诗学的背景性因素。本章从童年经验与缺失性体验的角度，探究沈从文的早期人生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认为沈从文的家世、童年经历、从军经历以及湘西特定的文化环境构成一种综合性的背景因素，对其人生观与生命观的形成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潜在地规约着其日后的创作，不仅影响到其创作题材的选择，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其艺术风格的形成。沈从文在创作上的整体追求及其文学观念，与其早期文学经历具有深刻的联系，或者说是其早期创作合乎逻辑的发展与完善。沈从文在早期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追求，成为一种基本创作取向保留下来。沈从文的早期创作对其文学观与美学观的形成，对其创作主题与文学立场的确立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第二章阐释了沈从文的生命观内蕴。生命本体观与生命价值观构成沈从文生命诗学的两个极其重要的维度。从这两个维度可以透视沈从文创作中的许多重要现象，把握到其创作独特性的许多重要方面。沈从文对于生命本体的理解与他对于生命本质的独特发现相联系，其生命本体观的最独特之处是对于“生命神性”的发现与张扬。在他看来，“神”是生命的本原与根基，是决定生命价值与意义的最高存在，因此，从根本上说，沈从文是生命的神性论者，颂扬神性成为其创作的整体性基调。相对于物质实体层面，沈从文更强调生命存在的超越性层面，这使他对于生命的追问能穿过复杂的现象层面指向生命的终极关怀和对于生命终极意义的肯认。另一方面，沈从文的生命观又呈现出一种深刻的内在矛盾性，那就是生命本体观与生命价

价值观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与其人生经历具有内在的联系，不仅深刻地影响到其政治观与文学观，而且在其创作中表现出来，并深刻地影响到其创作格局与艺术风格的建构。通过对沈从文创作中湘西生命形式与都市生命形式的对照，不难发现沈从文采取的是一种偏约化的生命价值取向。也就是说，沈从文一方面把湘西的感性生命形态偏约为一种理想化的生命价值形态，另一方面则把都市生命形态几乎整体性地偏约为“阉寺性”的生命价值形态，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审美视角的偏差。本章最后指出，沈从文生命观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与中外生命思想具有密切的联系。儒家的伦理价值生命观与道家的自然哲学生命观，以及西方现代生命哲学对沈从文的生命观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第三章分析了沈从文生命诗学的范畴。“生命”与“生活”、“人性”与“神性”、“人事”与“人生”是沈从文生命诗学三对极其重要的范畴。这三对范畴从不同的维度指向沈从文思想与创作的许多重要方面，共同支撑起沈从文的生命诗学构架，最为集中地代表沈从文对生命问题的独特思考，指向沈从文对人生价值与生命终极意义的追寻与探究，传达出沈从文的生命理想，尤其是“生命”这一范畴具有统摄性意义，居于沈从文生命诗学的轴心，成为沈从文生命诗学的基点。本章首先从生存体验维度、人性维度和价值维度三个方面厘定“生命”与“生活”的基本内涵，认为在沈从文的生命诗学中，“生命”与“生活”代表两种具有对立性质的人生形式，显示出沈从文站在人生价值终极性的立场上，对于生命价值与意义的独特思考与理性把握。从对“生命”与“生活”范畴的理解出发，可以把握到沈从文生命诗学另一对重要范畴“人性”与“神性”的基本内涵及其重要意义。沈从文人性观的理论内核是普遍人

性，他叫作“共通人性”，其基本内涵是自然人性与原始人性。在沈从文的生命诗学中，神性是与人性具有对应性质的重要范畴，与人性范畴互为补充，互为参照。一方面，神性以人性为基点，基于自然人性之上；另一方面，神性是人性的超越形态，是对人性的提升与优化，代表沈从文对生命超越性意义的肯认。在沈从文那里，其生命诗学的另一对范畴“人事”与“人生”具有复杂的内涵，与我们通常的理解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他对两者的思考主要落在文学创作的具体操作层面上，联结着其创作的各个重要方面，我们从中可以发现沈从文文学思想的独特表现形态和充分个性化的艺术运思方式。

第四章探索了沈从文创作的生命诗学景观。本章从沈从文的创作实际出发，通过分析其大量创造性的文本，把沈从文的全部创作归结为生命诗学景观，主要着眼于把握其创作的主导性特征与基本内涵，涉及其创作的取材、构思、主题、人物形象的塑造等多方面问题，试图以此去揭示其创作独特性的一些重要方面，并透视其创作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沈从文的艺术世界中，湘西生命形式与都市生命形式构成对照与互见的关系，前者以抵达生命境界为指归，在某种程度上显出哲学追问的意味，彰显出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后者则以揭示都市生态为指归，多落笔于都市生活的原生态与阴暗层面，针砭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文明病症，由此形成一个对立而又互补的生命世界，构成“生命”与“生活”的艺术镜像，从中表现出沈从文的生命理想与不同的情感取向。

第五章论述了沈从文生命诗学的形态与转换。沈从文的创作历程呈现出三个阶段性的分野，包含着两次转换。其早期创作具有明显的自我抒写性质，成熟期的创作重在人性抒写，后期的创作出现“向内转”的倾向，具有“抽象的抒情”性质，

具有更多神性抒写的成分。沈从文由自我抒写到人性抒写的转换是一次具有跨越性意义的成功转换，而由人性抒写到神性抒写的转换，由于多种因素的综合性影响则出现内在的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显露出艺术创造力的衰竭，最终导致沈从文由文学创作转向文物研究。从沈从文创作的生命诗学形态与两次转换中，不仅可以把握到沈从文创作的心路历程与精神走向，而且可以从中把握到沈从文“人性美学”的演变轨迹与生命诗学的建构过程及其基本内涵。本章最后指出，沈从文的基本文化选择联结着对于生命问题的深刻体察和思考。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他对于现代知识分子作为精英群体的审视始终伴随着复杂的心路历程，其文学道路的终结是多种因素综合性作用的结果，具有强烈的悲剧性意味。

本书结语部分强调指出，只有充分地认识到沈从文艺术价值的独特性与思想价值的独特性，并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得出公正的结论，还原一个真实而独特的沈从文，还原沈从文的创作独特性。

目录

导 论	1
第一章 沈从文生命诗学的背景性因素考察	19
第一节 生命：沈从文创作的结构性视角	20
第二节 童年经验的潜在影响	26
第三节 缺失性体验与早期创作	44
第二章 沈从文的生命观内蕴	65
第一节 生命本体观	69
第二节 生命价值观	79
第三节 生命观的内在矛盾性及其影响	95
第四节 中西文化对沈从文生命观的影响	104
第三章 沈从文生命诗学的范畴分析	117
第一节 生命与生活	118
第二节 人性与神性	130
第三节 人事与人生	146

第四章 沈从文创作的生命诗学景观	161
第一节 湘西生命形式	162
第二节 都市生命形式	174
第三节 生命形式的对照及其意义	182
第四节 《边城》的生命形式及其消解	186
第五节 《湘行散记》和《湘西》的生命世界	202
第五章 沈从文生命诗学的形态与转换	219
第一节 自我抒写	220
第二节 人性抒写	230
第三节 神性抒写	245
第四节 未完成的文学道路	261
结 语	269
附录一 沈从文视域中的鲁迅	277
附录二 沈从文与“京派”“海派”论争	315
附录三 沈从文论闻一多的新诗创作	327
参考文献	341
后 记	346

导 论

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对读者来说，他不仅对于文学的贡献是一个奇迹，而且他本身的生命经历也无异于一个奇迹。确实，这是一个不断创造奇迹的人。他的生命经历充满传奇般的色彩，其中有三次变化是最令人感到意外的。第一次变化是他以一个只有高小文化程度的人而成为著作等身的著名作家；第二次变化是因为多方面的原因，他突然在文坛上销声匿迹，转而在物质文化史的研究方面做出不凡的业绩；第三次变化是在晚年他才终于像“出土文物”一样被人发现，早年的作品得以大量出版，并陡然成为研究界的一个热点。沈从文这样的经历，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大概是绝无仅有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对沈从文来说，晚年发生的奇迹也许最具有个人意义，这表明他的作品已经初步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他的一些名作在某种程度上已获得经典意义上的定位，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无疑是梦寐以求的。对读者和研究者来说，发生在沈从文身上的奇迹则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但却是一个并不轻松的话题。历史也许总是沉重的，沈从文身上所负载的那部分历史又似乎格外沉重，最容易让人在沉思中体会到那份历史的沧桑感。在笔者看来，在沈从文传奇般的“三变”经历中，在他创造的奇迹中，似乎隐藏着比历史

更深更沉重的东西。那是完全属于他个人的东西，代表他的主体独特性，代表他看待生命的独特性，其全部创作独特性都可以从中找到根源。也许正是这种东西才使沈从文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并最终使他在尘封数十年之后又奇迹般地得以“出土”，让读者和研究者的目光再度聚焦在这位湘西的“乡下人”身上。

在1979年10月为长篇纪实散文《一个传奇的本事》重新刊发所写的附记中，沈从文不无苦涩地谈及自己的作品在建国后的遭遇，“我的作品，早在五三年间，就由印行我选集的开明书店正式通知，说是‘各书已过时，凡是已印、未印各书稿及纸型，全部代为焚毁’。随后是香港方面转载台湾地区一道明白法令，更进一步，法令中指明除一切已印未印作品，全部焚毁外，还包括永远禁止再发表任何作品。这倒是历史上少有奇闻。”^①建国后，沈从文几乎完全淡出文坛，不为读者所知。他在1959年3月给大哥沈云六的信中谈到过这一情况，对当时“已没有多少人知道我写过什么作品”感到极为痛心，认为这“真可说是一件相当奇怪的事情”^②。尽管他仍有少数几篇作品得以公开发表，但几乎都属于应景式文章，已完全失去他惯有的独特风格。因此，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在建国后不复存在，而代之以一个物质文化史家的沈从文。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中国社会政治的重大调整期，文学也因时而变，实现了由政治化到回归本体的重大转型。一大批作家高唱“归来的歌”重返文坛，一大批尘封已久的作品

^① 沈从文：《一个传奇的本事·附记》，《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35页。

^② 沈从文：《给云六大哥之二——1959年3月12日》，《沈从文别集·萧萧集》，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7页。

得以重新出版，成为“重放的鲜花”。但沈从文的“出土”却并不顺利，一直伴随着很大的争议。朱光潜在1983年初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据我所接触到的世界文学情报，目前在全世界得到公认的中国新文学作家也只有从文和老舍，我相信公是公非，因此有把握地预言从文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①现在看来，朱光潜所得到的“世界文学情报”也许不无片面性，他对沈从文的评价和预见却是极有见地的，但这在当时却引起一场风波。社会政治因素对于文学的制约性仍然存在，而且在逐渐趋于激化时，还会以出于惯性的行政方式干预人们对作家的重新评价。沈从文在这一时期致凌宇的信中表达过对这种情形的担忧：“我担心处，是过于誉美，易增物忌，虚名过实，必致灾星。”^②他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几乎在朱光潜的文章发表的同时，湖南岳阳的《洞庭湖》杂志在1983年发起历时达一年之久的对沈从文作品的讨论。在1984年发表的《沈从文〈雨后〉等作品座谈讨论纪要》中，该刊主编罗石贤等人认为，“《雨后》可以说是《毛毛雨》的姐妹篇”，“我看《雨后》是活生生的《春宫图》”，并在同时以该刊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对沈从文作品要做恰如其分的评价》一文中，则声称“编辑部的主要意图是，希望在赞美沈从文其人其作的‘热潮’中”，“打开一个小小的缺口”，“浇上一瓢冷水”，并“大喝一声”，促使人们警醒，尤其是文学青年更要避免“误入歧途”。这种论调可以说是建国前夕郭沫若等人把沈从文归为“桃红色作家”的翻版。郭沫若1948年年初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痛斥沈从文不仅

① 朱光潜：《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湘江文艺》1983年第1期。

② 凌宇：《风雨十载忘年游——沈从文与我的沈从文研究》，载《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334页。

“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而且“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图”^①。这种前后相承的论调表明，在单一的社会政治视角下，沈从文创作的丰富性内涵和独特性追求被剥离无余，其作品中所表达出来的强烈生命意识被完全遮蔽，其艺术风格上所表现出来的独创性也被扭曲为创作上的歧途。事实证明朱光潜的预见是正确的，在重新评价沈从文的争论中，以《洞庭湖》杂志为代表的论调很快就偃旗息鼓。在随后的重写文学史的热潮中，沈从文的行情不断看涨，被确立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不过围绕沈从文的争论并没有就此停止，而是深入到更深的层面，这也表明沈从文研究在不断取得深化。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具有综合性的特征，其全部创作呈现出非常复杂的艺术格局。长期以来，他要么被看作“空虚的作家”、“没有思想的作家”，要么被誉为“抒情诗人”、“乡土作家”、“水墨画家”、“文体专家”和“文字魔术师”。前几种说法已经破产，后几种说法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仍然代表人们对沈从文创作的基本看法。确实，就沈从文创作题材与风格的某一方面来说，这些称誉是有其道理的，但也表明人们对沈从文作品的阅读与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误区。这些称誉几乎都是针对沈从文的湘西题材作品而言，由此也造成对沈从文都市题材作品的遮蔽。在人们看来，沈从文只是一个典型的牧歌型作家，从而进一步造成对沈从文作品现实感的遮蔽，沈从文强烈的人生悲悯感与现实参与感在这种误读中被消解无余。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学沈从文只学其风习描写，不过得其皮毛。读沈从文而读不出现实感，现代文学思想魅力所在的使命感，

^① 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1948年3月1日。

也终不能读懂沈从文。”^①正是这种双重遮蔽，导致沈从文的本来面目一直模糊不清，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他作更为全面而深入的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准确定位，这也表明进一步深化沈从文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感。

沈从文创作上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无视和夸大其局限性都不是理性的态度。沈从文最初呈现在笔者的视野中，是一个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公共化”的牧歌型作家。随着阅读的深入，呈现在笔者视野中的沈从文变得丰富而复杂起来，笔者这才领受到阅读沈从文时的那种两极化的双重感受，对他的优长之处与局限性都有着比此前更深的了解。就阅读效应来说，他算不上一位作品特别具有可读性的作家。整体性地阅读沈从文，是一项非常需要忍耐力的工作。一位研究沈从文的学者发出这样的感慨：“如此大量的作品，如此参差不齐的局面集中在一个作家身上实在让人不胜惊讶而又感慨不已。”他为此而感到“深深的困惑以至隐隐的惶恐”^②。我在较为全面地阅读沈从文的作品时也陷入同样的困境，一方面为《边城》等众多小说散文杰作和许多优秀文论深深陶醉，另一方面又对其大量的芜杂之作和为数不少的几近复制性的重复之作几乎难以忍受，尤其是其前后期作品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使人很难相信是出自同一人之手。这种阅读中对比分明的双重感受，比阅读其他任何作家的作品都更为强烈，以至使我很难把这种两极化的双重感受统一起来。但是，沈从文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不管他的前后期作品之间、成熟之作与芜杂之作之间的差距是多么之大，既然出自同一主体，就总有其一脉相承之处，不可能完

^① 赵园：《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论小说十家》，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69页。

^② 范家进：《现代乡土小说三家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0~111页。

全没有一个统贯性的东西。就笔者阅读后的总体印象来说，尽管沈从文的前期作品极其幼稚乃至笨拙，然而是从生命中自然流淌出来的东西，流溢出生命之真，具有本色之美，与真实的人生出于一体，因而绝假纯真，自有其动人的地方，这也是其价值所在。这也许是沈从文初出文坛就受到关注并最终立足文坛的根本原因。包括这些早期作品在内的大量芜杂之作，不管其在思想和艺术上存在着多么大的缺陷，其基调都大抵出自生命之真，应该说，这是沈从文得以成功的秘诀。沈从文是一个紧紧抓住生命的作家，他从自我的生命体验出发，抒写生命之真，思考生命之理，这成为他全部创作的基调和底色。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沈从文的全部作品是有其内在统一性的，生命是其全部创作的统摄性因素或核心所在。

在笔者看来，沈从文是一个生命型作家。这样说也许并不确切，因为从广义上来说，所有的作家都应该是生命型的。文学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一种生命活动，而且是一种高级形态的生命活动。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其创作的最终指向总是离不开生命，其作品则是生命活动的形式，是一种生命形式。正如苏珊·朗格在其《艺术问题》一书中所指出的，“艺术结构与生命结构具有相似之处，这使作品成为一种生命的形式”。这说明文学与人的生命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不过就一般作家来说，其创作往往指向社会生活，停留于或仅仅满足于对社会生活表象的罗列或表层挖掘，而不能指向更深层更内在的人类生命状态。创作品格的高下之分就在这里表现出来，杰出作家的创作总是力图指向深层的人类生命状态，一般作家的创作则无力或满足于指向表层的人类社会生活。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沈从文无疑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生命型作家，这是他与一般作家区别开来的醒目标记。

长期以来,研究界有一个“沈从文之迷”的说法,认为沈从文思想和艺术上的独特性是一个难以解开的谜,这也是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之所在。如果真有这样一个“谜”,而且非要揭开谜底不可的话,那么也许这谜底并不神秘,可能就在于沈从文对于生命的追寻与探究。在某种意义上,他创作的主题都可归结为生命主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如此集中地以艺术的形式去表现“生命的复杂多方”,并且不管是从其深度和广度,还是就其看取生命的独特角度来说,沈从文都堪称首屈一指。他曾经这样明确地表白过自己对于生命的信仰,认为自己是个“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同时声称“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①对他来说,生命居于一切之上,对生命的信仰乃是最高的信仰。这深刻地影响到他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其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全部独特性都根源于此,并由此形成其独特的生命诗学。

生命诗学在这里是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其大致的含义是指直接指向人的生命,以生命观照为核心内涵,展示生命形式,同时赋予生命以审美关怀,以文学的形式展示出来的艺术世界。生命诗学强调文学与生命的内在关联性,认为文学的本质在于对人的关怀、对生命的关怀,文学形式是主体生命扩张、情感外化的生命形式,也是对生命本体进行审美观照的物化形式。文学对人的关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作家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通过文学创作实现自我拯救,这使创作成为其一种不可缺少的生命需要。真正意义上的作家都执著于探寻生命的真谛,追求生命的完美与至善,生命对其具有最高意义,因此真正的作家都不会只把创作当做一种求取生存的职业,而

^① 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7~128页。